

編後語

今年是五四運動八十五周年，這是一個從上個世紀起至今也說不完的話題。李慎之逝世一周年之際，許紀霖撰文紀念他並指出，李慎之晚年皈依自由主義，以一己之道德實踐，撐起自由主義這面大旗，是對五四狂飆傳統的繼承，而王元化則是繼承了五四理性主義傳統。他認為，在五四和80年代，啟蒙的知識追求和道德實踐是統一的，但到90年代二者卻分離了，以致出現當今的思想困境。另有邵建一文分析李慎之由年輕時「尊五四，尤尊魯迅」，到晚年「尤尊胡適」的思想轉變。如果說，90年代中共某些知識型官員放棄馬列主義，是回歸五四自由主義傳統，那麼，金觀濤、劉青峰則要探討五四新青年群體為甚麼放棄自由主義，歷史似乎走了一個輪迴。他們嘗試引進新概念（如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和研究方法，為這種關鍵性思想變化的原因尋找一個較客觀的答案。張寶明探討《新青年》雜誌同仁對國家、社會、個人三者關係的認識及思想轉變歷程。其實，在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的今天，這三者間的關係問題也日益突出。嚴瑜正是從個體權利與國家權力關係入手，力圖廓清、梳理90年代意識及其內在難題，並希望公眾與國家間，能夠就國家權力及制度如何改革和重建這些核心問題建立起共識。

許多人認為中國近年來作為改革對象的計劃經濟和國營企業，是照搬前蘇聯的經濟體制。但程麟蓀的研究指出，1949年後中國實行的計劃經濟並非一種全新模式，抗戰期間國民政府的資源委員會無論在理論和實踐上，已為推行計劃經濟和國營企業打下良好基礎。衛春回則分析40年代一批自由主義學人，在探討什麼是適合中國的經濟制度討論中，雖然在採用計劃經濟及市場價格體系上存有分歧，但卻不約而同贊成生產資料的公有制。

本期多篇文章都具有歷史的和國際的視野。陶德民以150年前引發日本開國的《日美親善條約》以及「吉田松陰偷渡事件」為案例，展示在當時處理日美糾紛過程中，美國就奉行其延續至今的外交思想——人權外交。盛邦和生動地刻畫出日本二十世紀極端右翼思想代表人物北一輝，是如何從「左派」立場和「底層」主義，走向極端民族主義和右翼軍國主義的思想脈絡。何偉業認為，中世紀的神哲學者伊本·提米雅對以拉登為首的當代激進伊斯蘭主義有重大影響。任軍鋒介紹了西登托普的新著《民主在歐洲》，討論美國的聯邦體制與歐洲的一體化實踐及其將會遇到的問題。高天民的文章分析了二十世紀中外藝術的發展與政治糾纏不清的關係。此外，秦暉談趙構和岳飛誰「愛國」與「賣國」的問題；周承人、李以莊則通過堅實的史料考證，重新評價了黎民偉在香港早期電影事業上的貢獻，均是值得一讀的好文章。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隨着本刊已列入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加上電子文本流通、網絡繁榮的現狀，為了維護本刊發表原創論文和文章的精神，我們修改了稿約文字，敬請作者、讀者細讀。